

创业一深造一再创业,只为争口气。从“另类海归”到中国最大律所“掌门” 王俊峰：为中国律师赢得国际尊重

本报记者 梁昌杰

独家
對話
几代“海归”看变迁(3)

【另类海归】

总想着有一天与外国大律师平起平坐,和他们直接竞争,为中国人争气

记者:相对于其他“海归”大学毕业就迈出国门,您是在事业有成之后,才开始踏上上海外求学路的。

王俊峰:出国留学其实一直是我的梦想。大学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去,后来分到贸促会法律部,梦想再次让位于工作需要。1993年受司法部深化律师行业改革的感召,我带着几个同事创建了现在的金杜律师事务所,之后忙得不可开交,留学愿望直到1999年8月才实现。

在贸促会我主要从事涉外较大尖端项目的谈判,经常和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打交道,正是这7年的历练,让我对国情、世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看着那些外国律师充满优越感的样子,心里很不服气,就想着总有一天要和他们平起平坐,和他们直接竞争,为中国人争气。说起来,下海创业是为了这口气,出国深造也是要争这口气。

记者:这些年来,你一边主持金杜的事业一边深造,不停地出国、归来、出国……你曾说自己算个“另类海归”,为何选择做如此辛苦的“另类”?

王俊峰: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国的律师行业从整体来说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目前,15万从业律师中,从事国际或高端法律服务的不足3%。金杜从1998年开始,每年安排一个合伙人去美国进修。当时有很多人不懂,认为国内法律行业发展的机会和空间都非常好,出国留学至少会影响一年的业务发展,压力和阻力都很大,但我还

【人物小传】



王俊峰,金杜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曾被司法部评为全国优秀律师。

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创办金杜律师事务所,随后一边创业一边出国深造,1999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正式留学生活,先后获得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6年间,金杜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律所之一,多次被国际知名法学杂志评选为中国排名最高的律师事务所,并被北京奥组委聘为2008北京奥运会唯一的中国法律顾问。

是坚持做了。

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律师,仅靠一次海外深造就想做到国际律师行业的“顶尖”,无异于缘木求鱼。同时,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国际竞争日益近切,逼着你走出去。1994年底到1995年3、4月份,我到荷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访问律师,1998年又到剑桥做访问学者。这之后开始正式申请去美国留学,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两家法学院同时录取,两个法学院都很著名,很难取舍,最后还是“加州的阳光”让我选择了伯克利。1999年读法学硕士后,又开始读法学博士,中间由于业务和事务所管理方面的需要和责任,直到2007年才全部读完。前后8年,往返于北京与旧金山之间,有些辛苦,但是值得。

【创业传奇】

假如一个国家的法律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律师事务所控制,这个国家就没有秘密可言了

记者:在许多人眼中,金杜律师事务所如今已是“中国的No.1”,作为“掌门人”,您最牵挂什么?

王俊峰:我并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很高的人。只是,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总觉得身为今天的中国法律人,有比个人成功更大的事业,看到很多本该属于中国律师的专业服务,被外国律师堂而皇之地拿走,其中不乏涉及中国企业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就会不安。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法律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控制,那那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经济安全或秘密可言了。对此,我们的软服务领域应该有高度的意识,中国的律师行业本身要发出声音。

留学期间有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在伯克利分校读博期间常跑回国内,一次回美国见导师,导师问,你不好好留在学校写论文,在忙什么?我回答,在忙金杜的工作,金杜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了。导师头也没抬,说:你知道吗?在美国,最大的事务所不一定是最好的。这句话令我震惊,让我意识到未来的路还很长,目光应当更远。

记者:据说留学期间您还做了个“大动作”,闯进硅谷,传奇般地创立了第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回过头看,这对你个人和中国律师行业

意味着什么?

王俊峰:2001年金杜在硅谷收购了一家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在美国的第一家分所。如果说这是个传奇,那也是时代的赠与。

当时在硅谷,有很多华人的高科技公司,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到那里投资,当地很多美国企业也希望了解中国的法律市场环境。希望我们的分所是个窗口、是个桥梁,能够伴着中国大步迈向国际的脚步,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同时也帮美国企业进入中国。这是国际化、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法律人应有的应对,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中国律师事务所涌现、加入。

记者:与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哪些经历最难忘?

王俊峰:最难忘的要算经过激烈竞争,金杜荣幸地当选为奥组委的法律顾问。

从2002年起,整整6年,金杜律师事务所作为北京奥组委唯一的中国法律顾问,全程参与了与北京奥运会有关的全部法律事务,投入了上万个小时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法律服务项目,为“法治奥运”、“和谐奥运”尽了一份力。

【追赶时代】

我们是极为幸运的一代。和时代的给予相比,我们本可以走得更远

记者:您觉得中国律师行业经历着怎样的变迁?未来的发展走向如何?

王俊峰:这些年走过来,中国的律师行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0年多前中国可能只有几千个律师,而且都是官办所,1993年以后逐渐和国际接轨,有了现在的合伙制,现在我们的专职律师有15万多人,每年还有20万人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同时横向比,美国每千人拥有3.5名律师,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有6名律师,而中国这个数字仅为0.7。我们需要追赶。



藏族学生心中的“阿妈”

秦光龙 刘永华 朱映涛



“我们从雪山走来,您给了我们圣洁的母爱……”这是一首由藏族中学生集体创作的诗,《献给年轻的阿妈》。诗中的阿妈,指的是“全国教育援藏先进个人”、昆明陆军学院附属藏族中学高级讲师胡艳。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胡艳,个头不高,声音清脆。1994年10月,全军唯一的教育援藏中学——昆明陆军学院附属藏族中学成立,在中学英语教学上有“两把刷子”的胡艳被特招入伍。

兴奋地走上讲台,迎接她的却是一张打满红叉的试卷:英语复试,全班60名藏族学生无一及格。纳闷的胡艳找到校长李志勤,才得知这些来自农牧区的孩子,大部分连英文字母都没接触过,个别甚至连汉语都还说得结结巴巴。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要让这些藏族学生学好英语,不光要‘面对面’站在讲台上,更要和他们‘心贴心’。”学藏歌,跳藏舞,说藏语……胡艳当起了学生的学生,从了解藏族风情着手,从头积累新的教学经验。

从教15年,胡艳所带的学生参加云南省高会中考,及格率从最初的1.7%上升到100%,在昆明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

让学生心中有阳光

洛桑巴珠牙痛不想吃东西,胡艳熬好稀饭端到他面前;桑布打篮球撞伤鼻梁,胡艳在家煮红糖鸡蛋给他补身子……“我是他们的‘阿妈’,当然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呀!”

其实,是胡艳随身带了一个小本子,随时记下每位学生的家庭、身体、学习情况。学生稍有异常,胡艳就想想方设法打听清楚。

“作为一名援藏教师,不仅要将知识传给学生,更要让每个藏族学生心中都充满阳光。”胡艳常说。这些年来,究竟帮助了多少学

图说新闻

升旗

9月10日,海关总署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海关官员和缉私警员面对国旗庄严宣誓:“我与祖国共奋进、我为海关作贡献。”国庆临近,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驻京的各中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400多人次。

“阿妈”跟前没秘密

“站上讲台,老师要做引领学生遨游知识海洋的战舰;走下讲台,老师要做校正学生人生坐标的灯塔。”这是胡艳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的教育心得。

一天,满脸笑容的扎西泽仁拿着一袋奶糖请胡艳吃。扎西泽仁悄悄告诉老师,这是她女朋友从上海寄过来的。拿起一颗糖,胡艳说:“恋爱的感觉就像这糖一样很甜,但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谈恋爱容易分心,现在的甜是暂时的,不会长久。”扎西泽仁郑重地点点头,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了。

在“阿妈”面前,孩子们是没有什么秘密需要隐瞒的。“优秀教师”、“全国民族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教育援藏先进个人”、“内地西藏班骨干教师”……15年来,胡艳获得了一个个荣誉,她教过的300余名藏族高中生,100%考上大学。

(据新华社成都9月9日电)

安子文同志二三事

吕 枫 孟连崑 杨建生

从1945年到1966年,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先后担任副部长和部长。我们有幸在不同时期与他一起工作,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宽广的革命胸怀,高尚的道德品质,给我们留下无尽的记忆和怀念。

“按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办”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央组织部随同中央由河北省建屏县南庄迁至北平。在机关搬迁之前,当时主持中组部日常工作的安子文对派往北平筹建住址的同志说:“派你们先头进北平筹备机关住处,你们一定要按二中全会的精神办事,不能铺张。有人提出要住饭店,那怎么行?我们在延安就有不少外国友人来,进了北平,更会有许多外国朋友来,那些大饭店,要留给中央招待外宾用。我们可以住老房子,能住下就行。中直机关单位很多,我们要照顾大局。”

当时市军管会供给部指定中央组织部选用的房子有三处:一处是西四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当时为一个临时大学所占;另一处是槐里胡同一号,当时是东北临时中学学生宿舍;再一处是灵境胡同与槐里胡同一号隔院相邻的一座三层小洋楼,是个空楼。当筹建机关住址的同志向安子文汇报时,安子文明确表示,学校我们还要办,不能占用,槐里胡同这个地方好。当汇报的同志谈到槐里胡同一号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又脏又乱时,安子文笑了笑说:“这没啥!房子脏乱,我们可以彻底打扫;毁坏之处,可以修理;树木花草,可以重新种植。就这样定吧!我们服从分配。”

“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

1963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到某省调查,发现在干部队伍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领导干部年龄较大,本地干部所占比例很少。这反映了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干部培养不够,需要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安子文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进一步组织干部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成员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并向中央上报了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专题报告。报告提出:“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如果不及早培养新的,将来就有后继无人的危险。”毛主席阅后批交中央书记处研究。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文件,要求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执行的办法和意见。为此,安子文又两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大力培养提拔年轻干部的要求和措施。会上,安子文提出,为了大胆地、积极地、破格地提拔优秀年轻干部,就必须用革命精神打破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在这个问题上,要选择几个标兵,做个榜样,说服那些想不通的同志。”

安子文首先从中央组织部做起,按照中央提出的选拔40岁左右的干部参加省一级和中央部一级领导工作的要求,选拔了两名年轻干部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破格选拔了两名更年轻的同志担任厅、局级领导职务,对推动这项工作带了个好头。中组部还从地、市班子中物色了一批年轻优秀的同志选拔到省、市委担任领导工作。随后,安子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的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意义和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就做好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安子文提出,希望在于中年人、青年人。每一个老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为党认真物色和负责地推荐确实优秀的年轻干部。看到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把担子挑起来了,就是看到了党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也就等于亲眼看到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熟悉了解干部是全部干部工作的基础”

安子文经常对组织部、人事部的干部说,熟悉了解干部是全部干部工作的基础,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干部工作也就不能真正做好。他说,了解干部不能只从鉴定表上去了解,也不能只从档案材料去了解。了解干部的正确方法是要从检查其工作上着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起来了解,并且要对干部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安子文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经常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接触干部。他曾在中组部部务会上号召大家主动上门去找干部谈心谈话,不要老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人家来找。在调配干部中,他充分考虑各方面关系,各个干部的特点。一次,中央组织部准备派一个老同志到南方一所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安子文亲自登门征求意见时,这位老同志表示愿意服从组织调动。后来,安子文从侧面了解到这位同志患有一种慢性病,不宜到南方工作,于是就取消了原议。事后他还告诫主管调配干部工作的同志说:“调派干部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对干部本身来讲,是应该要求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的,但组织部门也要尽量考虑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正是因为这样,安子文熟悉了解很多干部。有一次,周总理要求安子文推荐一个干部担任一项重要职务,安子文一口气说出了二十几个干部的名字,并作了简要介绍;当周总理考虑确定了其中一个人后,安子文又进一步提供了这个人的情况。对安子文能够如此熟悉为数众多的干部情况,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同志都非常赞赏。

“不用考虑了,我不知道”

1967年,康生为了陷害刘少奇同志,派人找安子文说:“现在有点头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子文义正辞严地回答:“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有叛变行为。”他还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现在我不想去钓鱼台,也不想见康生。”

1968年1月,安子文被投进秦城监狱后,康生又派人找他说道:“头功已经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立二功也有很大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然能进来,也能出去,你难道不想和你老婆孩子团聚吗?”安子文冷冷地说:“我不仅想和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不知道的事情不能瞎说。”来人说:“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安子文说:“你既然知道了,就自己去写吧。”

九大召开前夕,康生第三次派人找安子文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九大开开幕了。你若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决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不可能了,但是做个中央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子文说:“我的确不了解刘少奇有叛变问题。如果了解,我在中组部时早就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了。”来人还让安子文考虑,并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安子文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用考虑了,我不知道。”三次诱供失败后,康生恼羞成怒,对安子文施以严刑。对此,安子文横眉冷对,从容地说:“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坐过四次,不戴手铐脚镣我是这样讲,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

纪念与回忆